

论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变化和发展

实证主义自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以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表现于世,尤其是这种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仅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科学”作了系统的论述,而且在方法论、研究程序、研究方法上也作了具体规范性的要求,如此情况必然引起世界学者对此种哲学的重视。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众多学者论述实证主义,实施实证主义方法论,但对什么是实证主义的回答则各行其是。一般情况下,学术界总是把孔德()、穆勒()和斯宾塞()

()的思想作为实证主义的正统,或者扩展之,让其正统也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及美国的实用实证主义。然而,在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尤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学者们的争论就十分热烈了。例如,在社会科学的具体门类如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有人刻意追求所谓的实证精神,把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论视为律条,认为对此必须严格遵守;而有人则公开地要与实证主义方法论分道扬镳,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也有一些人,一方面同意实证主义提倡的那种追求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另一方面又批判它那教条式的方法论,认为那种方法论如同一条枷锁,镣铐着研究者的心灵,束缚着研究者的手脚。实证精神绝非仅是那种业已死亡的旧实证主义所限定的内容,而新的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更能反映出真正的科学精神。对于这种情况,早在 年代初,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季登斯()就抱怨说,实证主义“业已被宽广而且含混地作为一种批判的攻击武器使用……这个术语现已失去任何可接受的标准意义的要求”。①而到了 年代中期,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哲学家布利安特()在他所撰写的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内容的一书中,不得不以“一种实证主义还是多种实证主义()”作为该书的首章标题。②这种对实证主义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在 年代之后的有关定量和定性方法论之争中表现得异常明显。③

那么,究竟什么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有哪些最基本的规范要求?为什么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会出现如季登斯抱怨的那种情况?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

一

从语源学的角度,西方学者几乎都约定俗成地认为“实证主义()”一词最先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孔德造而用之,但这是一个误导。孔德的作品里确实论及实证的哲学(),实证的方法(),然而他并没有使用“实证主义()”这一专门性的术语。“实证主义()”是他的追随者创造的,但究竟此语谁先用之,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肯定性的回答。就“实证的哲学()”而言,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而真正赋予它生命,并使之成为一种哲学则归功于他的学生和他的秘书孔德。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如此观点:孔德是实证哲学的鼻祖。 — 4 年间,如何解释和阐明有关实证哲学的要旨是孔德著作里所讨论的主要课题。在那洋洋大观的六本“实证哲学教程”(u

)中,孔德基于对人类智力进化理论的假说,相信人类智力经过了三个连续发展的历史阶段,那就是、神学的或幻想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在孔德看来,前两者固然是人类智力发展必经阶段,但其结果是对真正地“认识自然毫无意义的”。令孔德感到兴奋的是,这种无意义的阶段已经随着牛顿时代的到来而渐渐消失,让位于另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他所谓的实证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类智力的真正任务是如何寻求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知识。人类对自然探索的兴趣并不是探索那产生现象的终极原因,而是研究现象性质的“怎样”。通过对“怎样”的研究,人类可以发现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中的法则。基于如此对实证的解释,孔德认为,所谓实证的或科学的,其性质应是实在

的、事实的、有用的、确实的、正确的、积极的。④

关于实证哲学,孔德在那六卷本里给以详尽而系统的解说。如果从总体上,尤其是从表现于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E·Du k)思想中去论及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其要旨可概括十二种之多。⑤但就其与本文所论述的内容而言,这里只择其有关孔德思想中的几点要旨。第一,在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下,孔德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种类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绝对的观点,拒绝对本体论的研究。第二,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对科学的本质进行探求,因为科学是人类唯一认识客观存在世界的手段。唯科学能获取知识,进而能发现客观存在世界的最高规律——人类社会规律。而完成如此之举,则必须结合人类的智力理性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经验主义传统,简言之,即理性和观察的结合。第三,孔德偏爱以实证哲学去替代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代人常用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在孔德看来,他的实证哲学并非仅仅关于自然、物理世界,而是包括社会在内的一种总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仅解释了人对自然世界知识的探求,而更在于以此为基础去认识社会,去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基于如此原因,孔德相信,对社会的研究可以像研究物理世界那样,能够获取科学的结果;而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也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就是他最先命名的社会物理学或他后来又改之为的社会学。

在历史上,孔德的上述观点都可以从英国经验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例如,关于反形而上学的思想,牛顿就向他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呼吁:“物理,当心形而上学”。⑥至于经验主义鼻祖培根与激进经验主义者休谟则更以反形而上学为终身任务。也正因此,当学者们在探讨实证主义的哲学倾向、知识观以及与科学之关系时,总是把它们与培根和休谟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孔德提倡的研究社会要追随自然科学的方法,霍布斯也曾明确地有过类似的表述。⑦然而,尽管如此,系统地把这些思想综合在

一起,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哲学则应归功于孔德。

应当说,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其宗旨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种宗旨明了、内容统一的哲学,却在本世纪年代末,在一个曾受日尔曼帝国时期的学术文化影响的地域,经过一些著名学者的培育,使老根长出新芽,又几经变种,终使原先的实证主义旧貌难辨,以至于从此之后,为辨识实证主义增添了困难。

二

实证主义的新种(国内有的学者称之为第二代实证主义)是在年代末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培育成功的。总体来说,这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仍是遵循经验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大法是:知识来自于对可感现象界的认识,任何知识的产生都应完全归于可证实的经验。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要以对概念意义的逻辑分析加以补充,而这种补充则是区别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根本标识,也是为什么他们要称如此学说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一新种名称并不是单一和恒定不变的,其内容经过了重大的改变。逻辑实证主义之名由费格尔(F°g)于年首先提出。年后,赖欣巴赫(R°b)、费格尔等人又改之为逻辑经验主义。^⑧这种名称的变换由它的内容变化所致,因为这种新种的实证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现象主义()到物理主义()的转变。

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开始时追求的是所谓现象主义。信仰如此学说的人坚持认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经验,一种来自于人类感官获取信息的经验;他们同时相信,哲学的任务仅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寻求有意义的命题。关于经验和知识的准则,无论是石里克(S°k),还是卡尔纳普(R°W),他们都坚持认为“可证实性原则($\text{f}^\circ\text{f}^\circ\text{b}$)”,即一切有意义的命题,真正的知

识,必须首先在逻辑上确保构成命题成分的可观察性。反之,任何不可观察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依据这种原则,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当然无法容身。但同时“由于它过分简单化,以致对科学语言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不仅把形而上学语句排除出去,而且也把某些具有事实意义的科学语句排除出去”。^⑨这种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过分狭窄的限制,很快受到众多人的反对。然而,真正使现象主义发生变革的原因还是它那强调个人经验的直接性。在现象主义者看来,知识的真正来源是个人的直接感知。“什么东西都可以怀疑,但是,最低限度,我们某些直接经验是可以绝对肯定的”。^⑩以“我的感官”去证实“我所相信的知识”,这当然可以增加“我对知识的确信度(g°f)”,然而,由于“我”是个人,个人所信服的经验知识未必他人也如此。换句话说,现象主义所推崇的知识观,充其量只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唯我主义的、主观性的经验,而缺乏客观性的标准。而知识,包括科学,首先一条准则就是它的客观性。

为了克服现象主义唯我论的主观性,纽拉特($\text{O}^\circ\text{N u}$)和卡尔纳普率先提出基本命题的主观相容性(ubj)参考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所谓的物理主义()。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维也纳小组的成员都同意“物理主义”所涵盖的内容,如作为该小组的主要干将之一的石里克就从不接受如此观点。但如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发展、变化对后来的影响来看,“物理主义”确是值得重视因而必须加以讨论的。

与现象主义相比,“物理主义”最基本的准则是科学语言应以物理语言为基础。物理语言基本属性不是由个人经验之所得,由个人而产生;它是一种“个人—集体”性质的产物。“鬼、神”之类的概念在实践上当然可被现象主义所排斥,但在理论上仍有存在的余地。因为,既然知识源于个人,那么,个人所描述自身经验是否真假则无法得以验证。物理主义则不同,经验是否真实不是由个人主观感觉去证实,而有“物理东西”作为证实

的参照物。桌子是一物理实体。它可能对不同主体个人有引起经验上的差异,但桌子在不同单个主体间产生的感觉、经验总有共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可以抽象为概念,可以成为人类以语言交往的符号。诚然,物理主义对感觉、经验、知识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在本体论上归为作为“第一因”存在的客观物质,但在认识论上它则改变了现象主义的“唯我主义”,而强调“主观相容性”。从现象主义转为物理主义,如同普金豪恩所言,“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有意义性的转变”,以致于在本体论上迈向实在主义()。

①由此可以看出,维也纳小组的实证主义固然在很多内容上与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有相同之处,但在对概念需求的有意义性的分析、科学研究和知识获取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证实方可接受等方面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有必要提出的是,维也纳小组培育出的实证主义不仅反对德国的那种绝对唯心主义和沉思性的形而上学,而且还对社会理论研究中的所谓终极价值问题提出激进性的否定回答。在德国学术史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学者们如文德尔班(W. Windelband)、李凯尔特(E. Kelt)、狄尔泰(W. Dilthey)等参与了一场原在经济学领域,后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门类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以及由此引出的关于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werturteil)问题的大争论。详细地论述这场争论需要一篇专门性的文章。笔者这里仅想说明的是,这场关于方法论和价值判断问题的争论,尽管诱发出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事实上,学者们提出的问题远大于他们已解决的。例如科学是否能够视为统一体,自然科学和狄尔泰提出的人文科学或译之为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是否遵循同一的方法论原则等。就价值问题的讨论而言,韦伯(M. Weber)的所谓“价值自由”思想受到了讨论者的重视,但那时(事实上,也包括今天)的众多学者并不认为他的观点回答了该问题的实质。无论对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

家来说,价值问题始终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然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又很难以经验的方法来实现。因此,这对崇尚经验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对此处理的方法是:所谓终极价值问题乃是个无意义(nutlos)的问题。而如此回答,显然又有别于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

三

年代末,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希特勒的政治迫害以及其他的原因,“维也纳小组”不得不彻底解体,其骨干分子或死亡,或外流于他国,一些外流到了美国。于是,实证主义在美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得以新的发展,而且在4~5年代,通过一大批社会科学理论家、方法论学家、研究者的努力和改造,最终又产生出一种所谓实用性的,或按布利安特的术语,称之为操作性的实证主义(operationalismus),②从而使之在运用上进入了最兴旺的时期。这种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实证主义,时至今日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实证主义在美国之所以得以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原因有三。原因之一是美国向有倡导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这一点可从唯一可视为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之性质看出。原因之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是实用——积极地转化理论为研究实际问题服务,而且只要为着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切可行的方法都可合而用之。原因之三是辅助性的研究工具,尤其是电脑的迅速普及,各种统计程序性的软件大量涌现,从而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技术性操作。

如同美国文化虽受到西欧文化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毕竟有自己的特色一样,美国式实证主义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其总体精神仍是注重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去除主观性。从它的诞生、成长历史来说,它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其中坚力量并不是那些

以哲学为专业的学者,而是一大批社会科学方法论家和研究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众多的美国学者一直以来是无多大兴趣去讨论那些纯理论、纯哲学的,他们更感兴趣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而且总是与哲学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诚如布利安特所说,美国的理论家和实际研究工作者常是各行其是,各自做不同的事。^⑬因此,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的诞生、成长,与其说是哲学家的功绩,毋宁说是由社会科学方法论家和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社会学向来被认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最主要的学科。而美国式的实证主义的诞生、成长情况在社会学领域里也表现得最为明显。自 20 年代后期始,在那些受英国实证主义(如斯宾塞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看来,逻辑实证主义提倡的那种需要严格实证的方法论原则无疑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同时认为,并以研究实践去证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行动理论、结构功能主义提倡的方法论合而用之,不是相互抵牾,而是并行不悖。虽然如此观念在其流行过程中也不时地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心中的主导地位。

定量法(quantitative)是这种方法论具体化的直接产物,这从定量研究所倡导的发现知识依靠归纳法、检验理论运用“假设—演绎”的(hypothesis-testing)模式可以说明。^⑭这种求知和检验理论的模式不仅为实践性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而且提供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研究程序。例如,对于一个信奉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研究者来说,下面的三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研究数据要能被世界上任何合格的研究者所认可。这就是说,一个研究者所获取的研究数据、资料必须有其合法性,能被其他的研究者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可同性质地获取。表现于研究实践,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们的行动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以观察、实验的方法为手段,去收集可观察性的、可检

验性的数据。失去这一点,整个研究也就失去其科学性。第二步,依据数据进行分析、总结、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假设(或理论);而且要遵循假设—演绎的检验逻辑,让这假设接受严格检验。第三步,依据检验后的假设性质去构建一个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以便让这种理论或理论性的结论对原先所研究的问题给以合理性的解释,对所研究问题中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作出合理性的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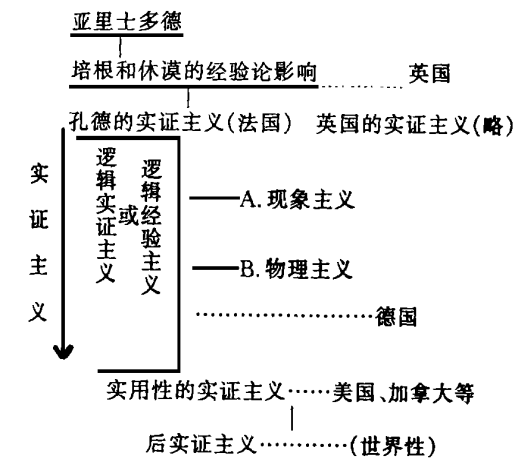
自实证主义在美国生根之后直至 20 年代初,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独领风骚。甚至到了 20 年代之后的“方法论大战”期间,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定量研究仍是主潮(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了)。以教育研究为例,直到 20 年代末,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硕士、博士论文仍是主要倾向。然而,到了 20 年代中期,由于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现象学(phenomenology)、本土方法论(indigenous methodology)等学派的冲击,那种在方法论上要求实证,在研究方法上以调查加统计为主要手段的实证主义范式(paradigm)面临极大的危机。而伴随这种危机出现的情况则是在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里掀起的一场“方法论大战”,即定量法与定性法(qualitative)的争吵。

如果说这场大战发起于 20 年代,那么,整个 20 年代则是双方交战最激烈的时期,而到 30 年代初,交战双方虽不能说完全偃旗息鼓,但局势基本明朗:双方求同存异,趋于以所谓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作为标识的统一。详细地叙述这场“战争”不是本文的宗旨。笔者在这里仅想陈述的是:为什么方法论研究的后实证主义得以产生,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后实证主义所涵盖的主要内容。从 20 年代初双方争论的情况来看,表现在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众多学者,一方面不满于那种明显地倾向于人文研究(humanistic)的范式,因为它的主观性和研究过程中需求的艺术性;另一方面又反

对那种教条性的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唯一科学性的方法论原则,即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律,分享共同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一些相信定性方法论的学者们看来,并非所有种类的定性研究都是人文性的(u)。相反,如在社会现象学、符合互动主义指导下的定性研究,只要研究者严格地按其方法论的要求去实施,其结果也是科学的。因此,如果“ - ”一词包含“实证的”、“相对的”、“准确的”等内容,那么,他们并不反对使用“ - ”一词。于是,一个业已形成并已流行于美国、如今也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观点是:对众多崇尚定性法研究的人来说,他们同意定量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反对视定量法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因而必然要反对那种唯定量法是科学的实证主义。从现时发展的趋势看,在“寻求研究的结果只要是科学的”共识下,那种业已形成的所谓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思想,即为了科学地研究一个问题,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以多元性的方法论去指导研究实践的观念,已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

四

现在让我们以图示法来显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情况,以便更清楚地表现出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不同内容,进而回答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从作为一种哲学派别命名的实证主义到今天作为方法论为主要精神的后实证主义已有近 5 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综观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它的生命胚胎源于英国(虽然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诞生于法国的孔德之手,成长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年代后,虽经一些哲学家如奎因的努力,但无论它是作为一种哲学运动,还是作为一种哲学学派的学说都已寿终正寝了。⑮然而尽管如此,实证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科学精神则依然存在,依然影响着尤其是向有崇尚经验主义传统的一些说英语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以致这种影响有力地促进了现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后实证主义的成长和发展。显而易见,作为哲学的实证主义固然与实证精神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终究有所区别,尤其在方法论上的区别。如此情况说明,由于众多人在谈及作为一种哲学运动、思潮的实证主义时,往往只在习惯上限于孔德或者包括英国的斯宾塞等人的实证主义(所谓第一代实证主义或经典实证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包括逻辑经验主义,即第二代实证主义),而对其方法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科学需求,则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明确的界说,这自然容易引起对“实证主义”这一术语的误解。诚然,仅就寻求所谓研究的程序、方法、结论都必须是科学的这一点来说,似乎是实证主义的专利。但事实上,科学实践中“寻求科学”,“寻求经验去支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包括“寻求研究程序、方法、结论都体现出的客观性”的宗旨等,则是众多社会科学家所共同的希冀,也是其他一些社会理论()共同追求的。社会科学家们如从广义上谈及的所谓“实证的”、“科学的”,其内容所指不仅包括旧实证主义,而且还包括各种新的实证主义学派。因此,仅就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无视广义和狭义的对“实证主义”的理解,其结果无疑要引起如季登斯那样的抱怨了。